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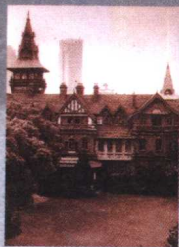
上海滩丛书

SHANGHAI TAN CONGSHU

51

汪仲华 编

海上名人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滩丛书

SHANGHAI TAN CONGSHU

海上名人

汪仲华 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名人/汪仲华编.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4
(上海滩丛书)
ISBN 7-5432-0524-6

I. 海… II. 汪…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上海市
IV. K820.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74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封面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上海滩丛书

海上名人

汪仲华 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4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ISBN 7-5432-0524-6/I·98

定价 14.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62662100 转

《上海滩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沙似鹏	
副主 任	刘其奎	姚金祥
	汪仲华	阮锦荣
委 员	葛昆元	田 骅
主 编	汪仲华	
副主 编	葛昆元	华将谟

目 录

秘密党员陈望道	叶永烈 (1)
列宁派到上海的特使	叶永烈 (13)
铁骨铮铮的陈修良	蒲 依 (25)
张爱萍将军在上海抗日烽火中	胡士弘 (39)
国共合作的秘密使者张冲	张令澳 (49)
中将·部长·教授	
——奇人黄逸峰	吴基民 (60)
神秘牧师董健吾	吴基民 (73)
“秦上校”姚溱	唐守愚 (87)
从法租界督察长到离休干部	周 丁 (102)
殊途同归	
——章乃器三兄弟	钟 群 (114)
多情多妻的康有为	秦维宪 (124)
我的祖父夏丐尊	夏弘宁 (132)
逃儒归释的李叔同	黄萍荪 一行 (140)
谁人不知沙孟海	陈修良 (149)
中医陈存仁的发迹史	秦瘦鸥 (158)
艺术奇才钱君匋	陈 芸 (167)
塞克和“二月里来”	陶 勇 (179)
海上闻人阿德哥	龚济民 (188)
李善祥，“宁波帮”的骄傲	胡士弘 (202)
“江北大亨”同洋人打官司	王延龄 顾育明 (215)
爱国大老板郭琳爽	庄新儒 (224)

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庄新儒 (239)
白手起家的“金笔汤”·····	楼德型 (253)
孤儿之父杨叔平·····	马万家 (268)
后记 ·····	葛昆元 (277)



最后遗言： “我吃不下了”

1975 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了一位 85 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由于双颊深凹，使原来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

他睡觉时，总是保持一种奇，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他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

他，便是陈望道。他既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 1920 年，他已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对他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他虽然自幼练过武术，毕竟年事已高，身体日衰。1977 年 10 月 20 日，晚餐供应可口的馄饨。他才吃了一只，便吐了出来，摇摇头说：“我吃不下了。”——这是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10 月 29 日凌晨四时，87 岁的他溘然长逝。

秘密党员陈望道

特的姿势，双手握拳，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他关照常来照料他的研究生陈光磊说：“我睡着时，倘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

原来，他睡着时，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出击”！

请别误会，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杭州一师“四大金刚”之一

从浙江义乌县城出发，翻过一座山，约莫走半天功夫，才到达山沟里一个小村——分水塘。这个小村跟冯雪峰故里神坛、吴晗故里苦竹塘，构成三角形。清朝光绪十六年腊月初九，亦即公元1891年1月18日，分水塘陈君元家喜得贵子，取名陈参一，单名陈融。这个孩子后来年长懂事之后，自己改名为“望道”：望，向远处看；道，人行之道，衍义为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或思想体系。长大后，他寄希望于革命之道。他把两个弟弟的名字，也改成“伸道”、“致道”。

他在山沟小村中长大。小村不过一百来户人家，陈姓居多。那时，村与村、族与族之间经常发生殴斗。为了护家，作为长子的他，自幼跟人练习武当拳。据说，年轻时他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如果有一根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他，立如松，坐如钟。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后来他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一天正在给研究生授课，忽地不时朝窗外望望。下课铃响，他走出教室，学生们才明白原来窗外有人打拳，招式不对，他走过去指点了一番，顿时众学生大为震惊——原来“陈望老”（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他也因此得了谐音雅号“城隍老”）深谙武术。

从6岁起，他在村中私塾张老先生教鞭之下，攻读四书五经，打下古文基础。16岁，他才离开小村，来到义乌县城，进入绣湖书院。后来，考入省立金华中学。

中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赴欧美留学。虽

然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这样,他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他日渐接受新思想。

1919年5月,陈望道结束了在日本的四年半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

浙江一师是浙江颇负盛誉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浙江上虞人,早年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到清政府通缉,避居澳门,后留学日本。1913年出任浙江一师校长之后,锐意革新(他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执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一师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语文教师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

浙江当局早就视一师为眼中钉。1919年底,借口一师书刊贩卖部负责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发表《非孝》一文,兴师问罪,要撤除经亨颐校长之职,查办“四大金刚”,爆发了“一师风潮”。邵力子在《国民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全国各地学生也通电支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一师……

义乌柴房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他躲进僻静的柴房,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

地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惟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此书。尤其是此书气势磅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此书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但是,他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翻译此书决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开头第一句话,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得知此事,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译,同时参考日译本。

这样,躲在僻静的故乡,陈望道潜心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

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好几回龙井绿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译完了，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据说是因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那儿的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2月起，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他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虽然他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那儿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由于他是柏文蔚的密友，而柏寓又正空着，便住进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李汉俊便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李汉俊、陈独秀校看了译文，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这时出了一件意外事件：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

1920年6月6日停刊。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正欲走马上任，就告吹了。

也真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搜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南来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因此也随之迁沪编印。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后来，陈望道离开了三益里，搬到环龙路跟陈独秀同住。

魏金斯基秘密来沪

就在这时，一个俄国人秘密前来老渔阳里2号。此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他为了避免引起密探注意，平时总是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戴季陶住所，跟陈独秀见面。此人名叫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与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等人于1920年4月初抵达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李大钊介绍他们来沪，与陈独秀会面。他们在4月下旬抵达上海后，便在戴季陶住所经常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与陈独秀一起出席座谈会。5月，即成立了上海的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八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

陈独秀跟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也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印了一千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初版的印行时间，版权页上标明“1920年8月”。令人费解的是，据王观泉著《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载：“1920年6月26日，（鲁迅）得译者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本年4月初版）。”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曾收到陈望道寄来的《共产党宣言》，是确有其事的。许多文章提及此事，通常说成陈望道直寄鲁迅。其实，当时陈望道跟周作人来往较多，他寄了两本《共产党宣言》给周作人，嘱周作人转一本给鲁迅。鲁迅当天便读了此书，对周作人说道（常被写成“与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发表了沈玄庐的文章，称赞“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彼”，指的便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毛泽东回忆，他读此书是“1920年夏天”（见斯诺《西行漫记》）。

北京图书馆珍藏着当年《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据陈望道之

子陈振新告诉笔者，50年代他随父亲去北京时，北京图书馆特地邀请陈望道前去参观，并要求在原版本上签名存念。陈望道问：“这是图书馆的书，我签名合适吗？”馆长道：“您是译者，签名之后成了‘签名本’，更加珍贵。”陈望道推托不了，端端正正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书如今成了北京图书馆的镇馆珍本之一。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它的理想，已在全球部分地区逐步变为现实，尽管不断受到新的挑战，但它的生命之树常青。陈望道把这本震撼世界的著作引进中国，使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变，他的生命之树也永远常青了。

同陈独秀发生尖锐矛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那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名义，遇事陈独秀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

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新青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这“二陈”配合默契。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诚如他在12月16日给胡适的信中所言：“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负责……”

胡适曾是《新青年》台柱之一。不过，他早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接陈独秀信，便把气出在陈望道身上，声称如今《新青年》落到了“素不相识的人手里”。不言而喻，那“素不相识的人”，便是指陈望道。他指责说，《新青年》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苏维埃俄罗斯》是当时一本宣传苏俄的进步英文刊物。

陈望道全然不顾胡适他们的反对，仍坚持《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也就在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按照陈望道当时在上海小组及《新青年》杂志担负的重任，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海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事情的经过，如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中所叙述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这件事，错在陈独秀。不过，陈望道脾气也急躁，年轻时有“红头火柴”的雅号，容易发火。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他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毛泽东批准重新入党

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

要求脱党。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也没有效果。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他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持共产主义。他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担任主任。丁玲以及康生、陈伯达都是他的学生。他跟鲁迅过从甚密,共同倡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9月,他在鲁迅的积极支持下,创办、主编了重要的进步刊物《太白》。

陈望道致力于修辞学研究,在1932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他跟他的学生蔡葵相爱。蔡葵是浙江东阳人,比他小10岁——出生于1901年5月28日。母亲早逝,蔡葵细心地照料着两个弟弟成长。她的大弟弟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名唤蔡希陶。小弟弟蔡希岳也是农业学院教授。蔡葵性格开朗,善交际,脾气温和,恰与内向的陈望道相辅相成。蔡葵能说一口流畅的英语,笃信基督教,担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微音》杂志主编。1935年9月,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被推选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此后担任此职多年。回国后不久,她与陈望道结为秦晋之好。她翻译了《艺术的起源》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是“老复旦”,早在1927年便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主编。

他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党内。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作了长谈,回溯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新回到党内。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

他的资历、身份，非同一般中共党员。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据陈望道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笔者谈及的回忆。）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的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据陈振新回忆，父亲重新入党后，家人也都不知道。父亲去世后，他在遗物中发现一本笔记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但写着年月、金额，从1957年6月起。他这才明白，这是父亲重新入党后逐月交纳党费的记录。

“文革”中受到总理的保护

在“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据说周恩来当时曾指示上海要保护三个人，即宋庆龄、金仲华和陈望道，特别提到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这样，陈望道才不大受到“炮轰”。

1968年，复旦“造反派”“深挖阶级敌人”，要陈望道作为“老复旦”参加“抗大清队学习班”。已经77岁高龄的他，每天去“学习班”开会，不慎在复旦大学教学楼前摔了一跤。往常，他若不慎跌倒，用一只手轻轻一撑，便会一跃站正。这一回却摔得很重。他叹道：“功散了，体力大不如前了！”他所说的“功”，便是自幼练得的武功。“文革”的冲击，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脑瘤